

回望京张 见证飞跃

7月17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指导,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铁道博物馆协办的“回望京张 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在京张高铁始发地——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以京张铁路从“自主肇建”到“智能领跑”的百年跨越为主线,聚焦“中国铁路起点”的历史地位,体现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投资、设计、勘测、施工并建成的官办铁路所镌刻出的民族精神,系统展示中国铁路工业遗产与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在铁路枢纽内系统呈现京张铁路的“前世今生”,同时此次展览也是“八站两场”主题系列展览之一,以高品质铁路文化内容丰富旅客出行体验,增强车站人文内涵,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交通+文旅+科普”的跨界融合。

**脉络清晰
演绎从35公里到350公里的时空对话**

展览将近代京张铁路的建设历程作为核心内容,以时间轴为骨架,以地标工程为血肉,重点突出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展览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百年变局,民族觉醒”展示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环伺,发出了“对于一路之工必借重外人,引以为耻”的呐喊,再现晚清政府决定自建京张铁路的决心。第二部分“铁骨穿险、自力更生”回顾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对铁路全线进行详细拆解,讲述京张铁路克服天险、突破世界难题的过程。第三部分“钢龙破壁、一往无前”展现了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通车的历史时刻。2019年京张高铁开通,与百年前的京张铁路形成跨越时空的“握手”。

**亮点纷呈
再现百年工程奇迹**

本次展览以新媒体技术、实物模型以及怀旧图集的方式,打造融合历史记忆与未来科技的全民性展览。展览展出的“京张铁路”铭文钢轨复制品,铸铁表面布满了岁月的蚀孔与锈迹。作为1905年的历史见证,它无声地诉说着当年“不用外资、不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时局艰辛与民族气节。智能动车组模型则以流线型的车身和精密的内部结构,直观呈现了当今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智能高铁的科技内核,展示了中国铁路在自动驾驶、智能运维领域的顶尖实力。除了实物模型,人字形线路沙盘生动解析了詹天佑如何利用“人”字形线路配合双机牵引,解决了南口至八达岭大坡度的世界难题。还有一组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的老照片,还原了筑路工人在激流中垫河架桥、在峭壁上开山辟路的壮阔场景。

**回望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

本次展览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围墙”,利用北京北站日均17万人次的客流优势,将文化服务延伸至旅客身边,打造一座弘扬民族精神的“流动文化客厅”。展览通过京张铁路与京张高铁的世纪对话,深刻揭示了中国从“自立”到“自强”、从“追赶”到“领跑”的精神密码。“我们希望旅客在候车的碎片化时间里,能看懂窗外这条铁路的份量。”主办方表示,展览不仅是一次历史回顾,也是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的致敬。

(王娟)

小楼与铁军：叶挺九江指挥部历史考析

樊嫒

在江西省九江市市中心的解放军171医院内保留着一栋二层建筑,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该旧址位于九江市浔阳东路东门口处,原为美国圣约翰中学校长达德公寓(《九江近代军事建筑调查档案》,九江市文物局,1989年)。该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设有拱廊与露天阳台,兼具教学功能与军事防御特性。1927年7月中旬,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师部驻扎于此,其作战室设于二楼东侧房间,可俯瞰九江城区要道。据《九江市军事志》记载,指挥部内设有直通南昌前线的电报线路,花园内马厩常备十余匹军马,保障了情报传递效率。

1927年初,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该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下辖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及教导队,满编约5500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六)。其中,军官队伍中共产党员占比超三分之一,班排级骨干多由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在九江驻防期间实有兵力约4800人,其中明确身份的共产党员约800人,包括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周士第(时任师参谋长)等。该师装备较为齐整,配备俄制莫辛-纳甘步枪及法制哈奇开斯机枪,教导队还设有重机枪训练班。

在九江驻防期间,是叶挺军事指挥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指挥部,他完成了三项关键工作。一是整训部队:将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夜战、突袭战术推广至全军;二是统战实践:通过九江商会筹措军饷,展现了其军政统筹能力;三是决策锤炼:甘棠湖会议中的风险评估与部队调度,为其后南昌起义指挥积累经验(《叶挺年谱》,卢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据《周士第回忆录》记述,叶挺常在指挥部阳台观察土兵操练,曾对参谋人员说:“此处虽无汀泗桥之险,却是问鼎中原的起点。”这段经历不但强化了叶挺注重地形研判、善用机动力量的指挥风格,也埋下了其后对城市暴动战术进行反思的伏笔。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指挥部成为叶挺军事思想成熟的实践场。1927年7月25日,叶挺在九江指挥部主持召开“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与贺龙、叶剑英等人商定部队开赴南昌的具体方案。此次密谈被党史研究者视为保障起义突然性的关键环节,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评价:“叶挺师的动向,实为起义成败所系”。

1927年7月26日,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从九江出发赶赴南昌;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中,叶挺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

部构成起义军核心力量。八一南昌起义参战部队共计2.3万余人,第二十四师投入兵力约4500人(含临时划归指挥的第十师一部),占起义总兵力的19.6%,仅次于贺龙第二十军(《南昌起义史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2017年)。南昌起义中该师承担了关键作战任务:第七十一团主攻松栢巷天主堂守军,歼灭国民党第六军第五十七团;第七十二团强攻贡院第三军第二十三团阵地,控制南昌城东线;教导队与第十师部队合围江西省政府,俘虏守军800余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挺在狱中写下《囚歌》,末句“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诗句虽成于狱中,但其精神内核与1927年甘棠湖畔那个酷夏的抉择遥相呼应——当一支以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的部队从九江开拔时,中国现代史的车轮已悄然转向。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是南昌八一起义的策源地之一,1987年12月被列为第三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守护红色历史遗存,传承红色文化基因,2021年9月九江市根据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相关原则,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的核心要求,以病害整治、结构安全加固为重点,开展旧址修缮工作。修缮过程中完整保留了建筑原有形制、结构、材质与传统工艺,最大程度维系文物原身历史风貌。修缮完工后,旧址依托原有建筑空间重新优化布展“八一序曲——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生动再现南昌起义前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公众真切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实现文物有效保护与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图片报道

盛夏时节,气候舒爽的大同迎来暑期旅游高峰,得天独厚的避暑优势与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凭借深厚的北魏历史底蕴、独特的石窟艺术魅力,成为中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近年来,大同市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以贴心、细致、优质的服务保障,全方位提升参观体验,也持续擦亮大同古都名片,让千年云冈石窟焕发全新活力。

(渊墨/摄)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李 端 王 娟

对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潭蓬运河价值考析

何守强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江山半岛的潭蓬运河,是开通于唐咸通年间的一条运河,由于它将三面临海的半岛于狭窄处拦腰截断却不借助自然河流实现两端海湾沟通,以两头涌入的海水支撑船舶通航,因而又有真正意义上中国古代唯一海运河之称。该运河长约2千米,宽约8米至13米,所穿越的江山半岛为表面有浅土覆盖的岩石山体,河道实质上是在石头上开凿的,其两岸和底部均为石质,是名副其实的石渠,这决定了它历经1000多年依旧保存较好,且未曾出现过其他运河常见的改道现象。地处边疆、海运河、石渠,这些特征使得潭蓬运河自诞生之日起便充满神秘和与众不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又进一步使其潜在的重要价值渐渐显现出来。

新发现石刻凸显潭蓬运河作为唐王朝加强边疆管控的物证作用

唐咸通年间,高骈收复安南和开凿旨在改善岭南西道治所邕州(今南宁)与所辖安南都护府之间交通的运河“天威遥”,这是唐王朝强化南方边疆管控的系列举措之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于高骈在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之后,为解决“自交至广”“安南至邕、广”即今越南至广西北部湾海路“馈运艰涩”问题而开凿“天威遥”(又有“天威径”“天威道”等称,本文统一使用“天威遥”)的诸多记载,成为当时及后人了解这条运河的重要依据。由于古文记载简略而抽象,改善此条海路的多处工程相继实施,以致由高骈开通的“天威遥”确切位置随后历代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广西文物部门对位于今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潭蓬村的一条古代运河进行考古调查,依据发现的“元和三年”“咸通九年”两处孤立的纪年石刻以及多批次出土文物,提出了该运河就是唐代高骈所凿“天威遥”,出于文物发现以所在区域地名命名的习惯,将“天威遥”定名为“潭蓬运河”。由此,“天威遥”位置有了初步结论,但因证据有限和研究不足,质疑之声依旧不断。

为了寻找更多证据和线索,揭开历史原貌,防城港市博物馆自2017年至2024年启动了多次潭蓬运河局部清淤和沿线考古调查,在淹没于水下的河道石壁上新发现了8处唐代石刻。新发现石刻中出现“咸通九年”5次,“元和三年”3次,另有“湖南军开六道”“水军”“唐”“天下太平”等关键信息在石刻中反复出现。这些新发现的石刻,解决了原有石刻的孤证不立问题,是石刻与古籍文献的多重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天威遥”便是潭蓬运河。

其一,河道石壁上以“咸通九年下手”为代表的石刻,与正史关于高骈在咸通九年奏请朝廷开凿运河的时间吻合;其二,“元和三年作”系列石刻,证实了《岭外代答》“守臣屡欲开凿”和《全唐文》“自唐皇有三都护”相关记载,即除高骈以外,另有多人组织开凿天威遥的事实。那么,元和三年开挖过这条运河的“守臣”,应是时任安南都护张舟,这在柳宗元为其所作墓志铭中有提及,潭蓬运河石壁上多次出现的元和纪年石刻与墓志铭实现呼应;其三,“湖南军”“水军”等石刻印证了《全唐文》所载“天威径新凿海派碑”碑文关于高骈:“遂命摄长史林诩,湖南军都将徐存古等,部领本将兵士并水手等一千余人,往天威径而疏凿之”的记载,进一步将咸通九年高骈派遣湖南军兵士、水手开凿的“天威遥”指向现今遗存的潭蓬运河。此外,今潭蓬运河所在地在唐代是唐王朝岭南道安南都护府辖区,与史书记载“天威遥”由安南都护组织开凿相符合。

新发现石刻进一步证实了潭蓬运河的身世,它是晚唐高骈收复安南事件的重要佐证,更是唐王朝维护边疆统一、加强边疆管控的历史见证。

科技手段成就潭蓬运河“天威”之名

潭蓬运河所穿越的是石质山体,开凿难度极大,故而便有数任“守臣”接续进行,但在高骈之前因开挖深度最大的一段河道难以攻克巨石,都无功而止。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咸通九年高骈接手之后,在投入大量人手进行开凿的同时,传说其在最艰难处,焚香祷告,祈求“电母雷公”相助劈开巨石,最终完成运河开凿。因得助于诸神,故得名“天威遥”。按此一说,显然“天威”与运河开通有关,此名是在高骈手中开通之后才出现的,此前如元和年间张舟所开凿之时并无此称。所以神话传说给我们带来了与运河开凿相关的一些线索和启示。

根据《岭外代答》《越史略》《全唐文》等古籍文献关于潭蓬运河开凿过程的记载,提到了使用尖嘴铁器开凿、排孔加尖开石、烧水浇破石等方法,“电母雷公”相助劈石则是高骈使用了火药爆破。前面几种方法,在近年考古调查中,运河石壁、河道底部随处可见的凿痕和诸多遗存的撬孔得以证实,就火药爆破来说,在高骈以前火药已出现,其威力也被认知,而高骈热衷炼丹,身边有道教背景和炼丹能手。因此,他具备使用火药进行工程爆破的主客观条件,且文献关于“电母雷公”数次辟石的描述也与人工定点火药爆破情形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多处疑似爆破遗留痕迹,另据群众反映被水库淹没的中段河道中遗存有几个直径10余厘米的孔洞,应是爆破所用。

传统方法加上火药爆破的综合运用,应是高骈超越前人凿通潭蓬运河的关键所在,出于种种目的他将科技手段神化,成就了“天威”之名却掩盖了科技的贡献,潭蓬运河应是迄今发现的火药运用于工程爆破的较早案例之一。

新出土文物进一步展现了潭蓬运河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以合浦港为代表,广西至迟自汉代起参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而造船和航海技术所限,沿岸而行的北部湾近海航线始终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海上交往的必经航线。进入隋唐之后,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辟,实现了广州经海南岛直达东南亚而不必绕进蜿蜒曲折的北部湾。在此情形下,近年潭蓬运河新出土文物为北部湾近海航线是否继续存在、唐代以后广西是否继续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防城港市博物馆2017年至2024年的考古调查中,潭蓬运河除了新发现多处石刻外,另收获了包括唐、宋、元、明、清等各时期的数百件陶瓷文物标本和洪武通宝等。出土的我国陶瓷涉及浙江、福建、江西、河北、广东等地的青瓷、



青白瓷、白瓷、青花瓷等产品,这些陶瓷文物为中国各个时期的典型外销瓷器。2025年,潭蓬运河又出土两件唐代瓷器,一件为广西北部湾和邻近的广东雷州半岛常见的四系青釉瓷罐,另一件为长沙窑白釉绿彩瓷执壶残件。这些新出土文物,为认识和研究潭蓬运河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与证据支撑,具有重要价值。

其一,我国多个窑场典型外销瓷器在潭蓬运河的出现,说明了这条运河的商贸功能与性质。在高骈手中开通的潭蓬运河,由于收复安南的历史背景和加强岭南西道内部交通的现实需要,其自诞生起政治、军事特征便较为突出。近年来,丰富的各地陶瓷产品的出土,说明了这条运河也具有商贸用途。其二,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产品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广西沿海商贸的兴盛和我国多个地区贸易商品依然选择通过北部湾外销东南亚、印度洋的史实。这些商品抵达潭蓬运河以前,主要应该是自浙江、福建海路到达广东再转入北部湾。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产品通过灵渠进入广西内陆,再借助四通八达的内河航线加上短程水、陆交通进入北部湾。但由于运输和时间等方面的成本考虑,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少数产品通过此一途径,它们最终也是从北部湾出海。其三,唐末至明清文物的出土,直接反映了潭蓬运河的沿用时间,体现出自唐代以后北部湾近海航线的持续存在。这有力反驳了以往关于潭蓬运河自宋代安南独立之后逐渐废弃的观点,说明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港东移广州、泉州以后,北部湾地区仍然参与其中。其四,长沙窑白釉绿彩瓷执壶的出现,填补了该窑产品通过北部湾航线外销的实物证据空白。目前,考古研究表明自八九世纪起畅销海外的长沙窑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广州出海,2025年潭蓬运河出土的执壶残件,为长沙窑产品通过北部湾外销提供了首个证据。

潭蓬运河出土的丰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运河促进商贸发展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它作为唐代及以后广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证物的重要价值。

中外文物混合出土展现了潭蓬运河的国际通道性质

如前所述,作为改善邕州与安南之间海路的潭蓬运河,其开凿的初衷在于服务唐王朝疆域内不同地区之间政治、军事、经贸的往来。当然,由于凿通之后成为途经周边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船只的避险通道,也使得潭蓬运河自通航起便具有了国际通道的特征,起初并不明显。到了约10世纪安南独立之后,其所在的前防城港由“内地交边疆”,由此,身处边疆和中国南方对外贸易前沿的潭蓬运河的国际通道地位骤然凸显,这在近年来潭蓬运河出土的诸如中国销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各类陶瓷产品,以及新发现的越南瓷器、西班牙银币等文物中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文物来源地,近年潭蓬运河新出土文物简单可以分为中国和域外两种。中国文物方面,近年该运河出土有唐代两广青瓷、长沙窑产品,宋元浙江青瓷,明清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等,均是不同时期中国的典型外销瓷器种类。各窑场对于这些产品的烧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海外贸易需要,而它们在距离边境仅有20多公里的潭蓬运河出现,其原计划目的地必然是东南亚甚至是印度洋市场。从中国出口产品流向海外市场来说,潭蓬运河无疑是具有国际通道性质的。域外文物方面,主要有14世纪至17世纪越南陶器和18世纪西班牙银币等。目前,潭蓬运河出土的越南陶器有数十件,包括青瓷、青花瓷、酱釉瓷等种类,这些产品主要来自越南朱豆窑和周边其他窑场,是典型的越南外销瓷器,且多数是仿制或受到中国同类瓷器的影响。例如,出土的“官”字款印花青瓷碗为仿制中国青瓷产品,出土的青花碗、碟等具有受明清中国青花瓷烧造技术影响的显著特征等。

越南外销瓷器在潭蓬运河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越南瓷器通过潭蓬运河外销中国。目前在潭蓬运河以东的防城港洲尾贸易场遗址、广东南澳青澳湾沉船、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多处遗址出土或出水有相似的越南外销瓷器,进一步说明了存在一条经广西北部湾越过琼州海峡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再转往我国台湾及日本等地的越南航线的外销线路。另一方面,出土的越南瓷器仿制中国产品或呈现明显受中国陶瓷技术影响的特征,既反映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技术的传播,也体现出商贸、技术交流的双向性。

此外,潭蓬运河还出土了两枚18世纪西班牙银元,这与距其不远的怪石滩海域出水的两门16世纪至17世纪欧式船炮共同说明了彼时西方殖民、商贸势力已经涉足北部湾。总之,中外贸易物品在潭蓬运河的混合出土,展现了该运河的国际通道性质,也提示我们,对于潭蓬运河的价值认识或需将其放置于南海贸易等更高层面去观察。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防城港市博物馆研究馆员)